

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创作现状与突破路径:基于《1936 兰州兵变》的症候分析

刘志豪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甘肃省兰州市 730070)

【摘要】甘肃抗战题材影片在国内主旋律电影市场中难以占据一席之地, 甘肃抗战题材影片主要受到影片质量不足以及宣传发行力度不足的双重影响。本文以影片《1936 兰州兵变》为例, 深入分析其创作和宣传发行中存在的问题, 并从人物塑造、情节构建、主题表达以及制作发行等多个维度探讨问题的根源, 进而探寻甘肃抗战题材影片的可行性创作路径。

【关键词】甘肃抗战题材电影; 《1936 兰州兵变》; 创作症候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Gansu Anti-Japanese War film creation: Based on the symptomatic analysis of "1936 Lanzhou Mutiny"

Liu Zhiha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Some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 on the overall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Gansu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aking the film "1936 Lanzhou Mutin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creation, publicity and distribution, and discuss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haracter building, plot construction, theme expressio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n explores the feasible creation path of Gansu Anti-Japanese War films.

[Keywords] Gansu Anti-Japanese War film; 1936 Lanzhou mutiny; creative symptoms

一、内在原因: 影片质量欠佳

甘肃拥有着革命历史发展流传下来的红色文化, 王贵禄《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文艺运动论略》一文中将甘肃文艺运动看作是中国抗战文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从甘肃文艺运动的勃兴、甘肃文艺运动版图以及甘肃文艺运动的繁荣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杨忠《抗战文艺运动在甘肃》则从文化名人茅盾、老舍、高一涵、顾颉刚、黎锦熙、塞克、郑君里、萧军、焦菊隐在兰州团结文艺界, 纪实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的兴盛以及文艺的现实生活化和刚健化、质朴化三个方面论述了甘肃抗战文艺的主要功绩和贡献, 认为甘肃抗战文艺是全国抗战文艺运动在西北一支重要力量。叶娟娟《甘肃抗战文学研究》以抗战期间甘肃的宣传报刊、社团、作家创作为研究现象, 补充了甘肃抗战文艺的疏漏, 突出了抗战时期甘肃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李荣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甘肃抗日救亡运动》梳理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党的地下斗争领导组织——中共甘肃工委的成立、发展以及组织甘肃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些都为甘肃抗战题材电影提供了创作源泉,

作者简介: 刘志豪, 男,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剧本创作。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化建设视阈下的甘肃抗战文艺运动研究”项目编号: 2023QN023 阶段性成果。

注入了活力,产出多部影视作品,如《浴血誓言》《西风烈》《决战兰州》等影片,尽管近几年持续产出,甘肃抗战题材电影的总体质量相对不高,出现了“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整体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局面。以电影《1936 兰州兵变》为案例,从人物塑造的刻板化、情节发展的同质化以及主题思想的浅显化这三个内在方面对该影片进行分析。

(一) 人物塑造脸谱化

抗战题材电影塑造或是英勇或是伟大抑或平凡的英雄人物形象,英雄人物是抗战题材电影塑造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承载着某一时期主流价值观念。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多电影制作者尝试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其具体表现形式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切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时期的电影)。传统的脸谱化式的人物形象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消费的需要,多元化,立体式的人物形象逐渐成为影视作品创作的主流,而类似于“卡利斯马”全知式的人物形象也不再被人民群众所期待。

高尔基曾提出“文学即人学”的概念(引文出处是《文学原理》中《谈技艺》一文,季摩菲耶夫著,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 1955 年版)作为人类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如果抛开“人”不谈,文学又何以安身立命,电影艺术同样如此,电影艺术中的人物作为叙述的核心、既是影片矛盾冲突的制造者,也是影片塑造的基础。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在人物塑造上略显不足,影片《1936 兰州兵变》讲述了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事变时解沛然受张学良指派亲赴兰州平息了鲜为人知的兰州事变。解沛然临危受命成功潜伏于国民党五十一军,并立功参谋造反平定兰州混乱局势。影片利用一定剧情来铺垫解沛然与冯雷之间的友谊,同时展现了解沛然与自己爱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并没有使得主人解公沛然的人物形象丰满起来,倒是显得剧情略显拖沓,该片中主人公解沛然被塑造为一种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反观同题材抗战影片《八佰》,摆脱了“卡利斯马式”的人物塑造,该片人物老算盘摆脱了以往类型影片“高大全”“伟光正”的完美形象,而是解构了主人公概念化的符号形象,“老算盘”在面对战争的残酷也会感到恐惧与退缩,他经过一系列事件的洗练,逐渐成长为保家卫国的英雄,成为有血有肉,真正意义上的人。该片生动展现了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一群英勇无畏的英雄人物。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牺牲自我,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独立,展现出了崇高的奉献精神。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不仅令人感动,更激发了观众对那段历史的敬仰与思考。

(二) 故事情节同质化

故事情节本身的重要性(和矛盾冲突以及戏剧性)是保证观众去影院观影的内生动力。类型电影是通过多个情节点共同构建主要故事线,情节点集中了矛盾、渲染了冲突、深化了主题、刺激了观众。同样,甘肃抗战题材电影能够吸引观众,升华主题的关键因素也是需要合理设计故事情节。该片以“兰州事变”为主要故事情节,讲述主人公解沛然与敌对特务机构之间的博弈,如主人公沛然与其妻子在饭店就餐,敌对特务对沛然严格监视,沛然利用自己的警觉与机制巧妙躲避监视等等。该片主要采用二元对立式叙述方式,正反阵营之间人物关系简单明了,但在叙事手法上与大量同类型电影极度雷同,观众一看便知,这与众多谍战片情节相似,具体表现为“正方阵营秘密执行任务→被反方阵营察觉→正方战胜反方阵营→正方顺利完成任务”,故事情节同质化问题严重,观众往往看了三分之一便可大致猜测之后的故事情节,这就影响了抗战题材影片的流畅叙事。综上,影片《1936 兰州兵变》中故事情节同质化严重。该片在叙事手法上遵循了“三一律”的原则,即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主人公解沛然在一个空间内化

解危机,使得故事内容受到限制,故事情节单一,使得在受众接受层面来看,观众的观影期待受限,在相对固定空间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观众易产生视觉疲劳,进而大大降低了影片的可看性。

(三) 阐释影片主题浅显化

文学艺术的创作受市场经济影响,尤以影视行业为最。像好莱坞模式的工业化生产也成为当今影视创作的基本操作。在这种创作环境下,重提“文以载道”很有必要。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是最早提出较为完整的“文以载道”思想的,他认为“文”就好比是车,而“道”就好比是车上所装载的物品,通过车的搬运,可以达到最终目的地。^[1]艺术是要通过某种艺术表现形式来抒发作者情感或者反映生活现实,而文化则代表特定时代下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品质精神等。“文以载道”可通俗地理解为文艺作品在不同时代所包含的文化精神。以影片《1936 兰州兵变》为例,该片所承载的文以载道显得过于直白与简单,该片的主题立意是明确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但表达爱国主义这一主题的手法太过浅显,换句话说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很容易把握该片的中心思想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该片对于这一精神内涵的表述手法上也较为浅显化,片中充斥了大量口号标语式的台词,影片着重表现解沛然为了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四处奔走,同时展现一些英雄人物的英勇牺牲,情节只停留在单纯叙述上,如沛然好友冯雷的牺牲就略显突兀,冯雷去围捕孙处长,在部队已经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选择听信敌对势力的话出去谈判,最终中了埋伏牺牲于此,浮光掠影般地浮于表面,自始至终未能和观众之间产生共鸣。反观《我和我的家乡》,其中,范老师用行动证明了下乡支教的可贵,一个信念便是一生坚守,以及因为一个承诺一种艰辛而决心治沙种苹果的乔树林,让村民见证了努力的奇迹。影片通过普通人的叙述视角,讲述像范老师这样的乡村教师如何表现自己的家国情怀,进而与观众共情,在传递家国情怀的同时也彰显了人性的光辉。

二、外在原因:宣传发行力度不大

电影宣传发行作为电影完成后面对市场的重要一环,是必不可少的,电影宣传发行具体指的是涵盖两个概念的,即宣传与发行。“宣”主要是针对观众,“发”主要对院线和影院。营销行为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影响影片票房的主要因素之一,^[2]电影营销工作的核心是体验价值的创新。^[3]甘肃抗战题材电影相较于同档期的其他题材影片电影被观众了解程度不够,主要外在原因是此类型影片的宣传发行力度不足,其具体表现为相关政策支持不充分,宣传渠道受限以及发行模式单一三个方面。

(一) 相关政策支持有限

甘肃在地理位置上深处西北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其影视文化发展水平较慢以及相关影视设备,相关影视人才储存不足,导致本地区影视行业无法吸纳足够的投资成本,同时依靠甘肃本土行业内力量又远远不够,因而,就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资金的注入就尤为重要。近年来电影营销转移重心,电影营销团队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放在短视频和短视频平台,试图获取高额的票房回报。^[4]电影《1936 兰州兵变》的制作成本较低,相关专业人才也不足,同时外部资本的投入较少导致影片自身质量不足,加之人们对娱乐需求越来越高,再加上电影产业突飞猛进,影片类型日趋多元,使得娱乐片大受欢迎,主旋律电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在此情况之下该片相关政策支持也不够充分,没有投入足够的人才支撑和政策支持导致最后影片所呈现的质量欠佳,进而导致出现宣传发行资金和力度无法跟进等问题。2021年底《“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正式发布(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以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创作生产优秀电影作品为中心环节,以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大力繁荣电影创作生产。对于

甘肃电影能否积极良好地发展,政府给予一定根本有效的政策支持是极有必要的,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甘肃电影的未来发展。

（二）宣传渠道受限

电影《1936 兰州兵变》的宣传渠道受限,搜索各大门户网站相关报道,传统媒介的宣传渠道只有在省台或者地方台有简短的新闻报道,网络平台几乎缺失,很难搜索到一点与该片相关的宣传新闻;线下宣传活动方面也寥寥无几,在主流网络媒体平台几乎搜索不到相关的宣传新闻;社会化营销方面主流的社交软件平台推送有限,以至于甘肃本地观众都很难及时了解该影片的相关讯息。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创作、生产、宣发、营销等重要环节。^[5]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下,随着互联网平台播放的增加,抖音、快手、火山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对于电影行业宣传方式有着不小的冲击,这也使得电影的宣传模式以及宣传渠道发生改变。传统的宣传与发行模式是以线上制作海报,发布一些预告片以及花絮加以线下举行的开机仪式和首映仪式。短视频播放的兴起也使得电影宣发模式发生改变,现今电影宣发除了继续保持传统模式之外,借助短视频播放平台,电影在正式上映之前会在各个短视频平台抛出一些话题性的视频,或关注电影本身内容,抑或一些相关花絮以及参演明星的相关新闻,例如 2024 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热辣滚烫》,该片在上映之前在各大平台投放了大量相关短视频,同时以主演贾玲减肥百斤为看点,在影片上映之前就收获了众多关注。综上所述,传播渠道的受限是导致甘肃抗战题材电影无法在院线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发行模式单一

随着大众审美趣味的逐渐多元化,以及新媒体平台的悄然崛起,传统的线下发行在市场化环境中不再具备竞争优势,市场的迅猛需求,逼迫电影发行走线上线下互补的发行路线,市场在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中逐渐占据主导趋势,同样也在刺激传统的发行方式发生改变,无论是网络发行、分账发行、买断发行、保底发行还是雇佣发行都为中国电影行业注入活力。甘肃抗战题材电影的发行模式极度单一,以至于甘肃抗战题材电影放在极少的特殊院线排片之后,如影片《1936 兰州兵变》在主流院线几乎没有排片,只有在特定的影院有相关政策支持下才会出现极少的特殊排片。该片也并未进行互联网发行,寻求同主要视频播放网站如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线上播放。近几年,互联网对电影行业的影响越来越深,出现了互联网发行和传统院线同步发行,传统的发行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环境下人民的需求。在肺炎的肆虐之下,2020 年春节档新电影几乎全面撤档。而《囧妈》另辟蹊径,直接越过发行和院线,于网络端上线,成为第一部春节档线上首映的电影。在此环境中甘肃抗战题材影片发行渠道的单一也是影片在宣传发行中有所局限的原因之一。

三、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创作策略

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如何在国内主旋律电影市场站稳脚跟,其一表现在其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甘肃抗战题材电影究其本质是对某一重要历史时期或事件的影像化表达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甘肃观众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感。其二表现在其经济价值有效增值,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可以丰富甘肃本土电影影视市场的类型题材,进而推动甘肃红色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

（一）吸纳影视人才：打造本土精品甘肃抗战题材

正如前面提到的,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受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从而导致此类型影片质量不高,它面临着艺术与市场上的双重考验。一方面,甘肃抗战题材电影也要追求一定的艺术性,蕴含着一定的思想;另一方面,甘肃抗战题材电影要能在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在浩如烟海的电影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就要面对如何打造精品甘肃抗战题材电影这一问题。

当前文化产业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来看,其在文化产业大阵营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视产业的发展,需要优秀人才的支撑,党的二十大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一件作品能被称为“创作”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件作品或是主题观念,或是表现手法,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崭新和独特的。这有时依赖于艺术家对私人经验的深度挖掘,有时来自艺术家单纯寻求与他人或既有作品的差异。^[6]优秀的影视人才是作品质量保障的基础,比如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电影《南征北战》,就是成荫、汤晓丹导演的合力创作,该片在艺术和市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近年来各大主流电影都是集多位导演之力,形成拼盘式电影,又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影视作品,同时集合众多优质演员共同演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上述电影中都实现了“在符合最广大的公众群体的生活体验和诉求的同时使他们受到感动和教育”,这对于打造本土精品抗战尤为为重要。^[7]借鉴同类型题材影片的成功之处,吸纳全国各地优秀影视人才对于打造甘肃本土精品题材尤为为重要。

（二）拓宽传播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2003年,美国媒体融合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跨媒体叙事概念,指“一种通过多媒体平台传播故事并吸引受众通过多媒体平台积极参与到故事情节的接收、改编和传播过程中去的叙事策略”。^[8]电影实现跨屏传播极大丰富了观众的观影体验,随之而来的是沉浸式的观影体验。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电影在网络平台上的传播渠道也得以拓宽,电影的网络传播也成为当下观众观看电影的重要方式。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影艺术与新媒体平台之间可以有机结合,多元化的新媒体平台在拓宽了电影的传播渠道的同时也满足了观众个性化需求。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年轻用户视听消费的主要渠道,也正在成为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9]大量移动终端设备(如手机、平板)的出现改变了观众在观影时的方式也改变了观众观影时的时间与空间,这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当下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观影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受众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具有了更加主动的地位。电影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交互性体现主要是观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创作团队之间进行交流,反之创作团队也可以根据得到的反馈与观众交流实现双向传播,这在一方面有助于制作团队对影片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又在另一方面使观众获得更加良好的观影体验。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可以通过网络传播有效拓宽传播渠道,加快传播速度,提升观影数量,对于甘肃本土抗战题材电影的传播推广起到有效的延伸拓宽。

（三）深入发掘甘肃红色文化资源：故事情节经得起推敲

现如今电影行业发展迅速,市面上不同类型影片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也是观众主观能动性的增强,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这就使得甘肃抗战题材电影不具备竞争优势。这就要求甘肃抗战题材电影需要在电影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突出表现,内容与形式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内容是显性的而形式则是隐性的,二者都为电影的题材和主题服务。对于内容而言是观众最为主观的感受,也是观众直接把握电影主题的重要因素,因此内容对于电影本身而言就尤为重要。

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甘肃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首先是靖远起义、两当起义、太白起义、红军会宁会师等;其次是贾东方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甘肃流徙文学研究》梳理了1937年7月甘肃抗战后援会成立后,陆续兴起的儿童演剧队和演出剧团以及西北抗战剧团、甘肃青年剧团、新西北剧团、集训队剧团、联合剧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全国抗战宣传三队、中国戏剧协会演出队、新安旅行团也

相继在兰州演出。这些剧团和宣传队先后排演过戏剧和话剧，一时间掀起轰轰烈烈的甘肃抗战剧运活动；还有甘肃文艺报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反映抗日及本地抗战生活的剧本，如《最后一粒子弹》《家庭黑影》《农村被清查》《保卫祖国的孩子们》《父子》《花袭》《觉悟》《亚细亚的黎明》《女将军》《女兵马兰》《沙漠之歌》《朱仙镇》等。涉及甘肃抗战文艺具体的艺术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话剧等的研究有唐翰存《抗战时期“西北诗运”考述》具体以《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生路”“草原”“诗歌专页”和《西北日报》的“绿洲”“力行”“塞角”为例，厘清贯穿整个战争期间兰州的诗歌活动，认为在烽火弥漫的抗战岁月里，“西北诗运”不仅重振了一种边塞精神，也为新文学尤其是诞生不久的中国新诗，贡献其独特的西北风格与诗写方式。以上都为甘肃抗战题材影视剧创作者提供了丰沛的素材。

在深度挖掘甘肃红色文化的同时，对电影的内容和故事情节进行加工处理，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观众对充斥着学理性以及教条式说教的影片嗤之以鼻，当下具备“平滑之美”的影片更容易受到观众的喜爱，“平滑之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精英文化的一种消解。主旋律+商业化对于甘肃抗战题材电影创作来讲是很好的创作模式，能够打破传统说教式创作，聚焦人民群众，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进而与观众共情，观众通过观影来了解历史事件与主流价值精神，与此同时加之娱乐化元素，能够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期待，激发观众的观影欲望。

四、结语

通过对影片《1936 兰州兵变》分析阐述，影片主要展现了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不畏困难、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甘肃地处中国西北部地区，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保留着大量的红色文化，做好甘肃抗战题材电影有助于助力甘肃本土电影的发展，同时带动甘肃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甘肃抗战题材电影目前暴露的诸多问题揭示了该题材电影尚需经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为了不断丰富和完善甘肃抗战题材电影，迫切需要引进人才，拓展传播途径，并深入探索挖掘甘肃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这些努力，促进甘肃抗战题材电影的进步，并最终实现其在国内市场上的更大影响力，从而推动甘肃本土影视产业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 [1]北宋 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版.
- [2]沈建军,吴春集.短视频营销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研究——基于猫眼平台数据的实证分析[J].电影文学,2021,(03):18-24.
- [3]吴春集.中国电影营销:理论与案例(1993—2012)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6.
- [4]初金哲,周丹.新媒体时代电影短视频营销的现实困境及优化策略[J].电影文学,2024,(13):49-54.
- [5]贺艳《试析新的媒介生态对电视剧创作的多维影响》,《中国电视》2018 年第 6 期,第 12—17 页.
- [6]李丰.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人工智能能够取代艺术家吗? [J].现代哲学,2018,(06):95-100.
- [7]王一川.主旋律影片的儒学化转向 [J].当代电影,2007,(03):15 — 20.
- [8]Jenkins H.,Transmedia storytelling,MIT Technology Review,2003(1), p56.
- [9]牛梦笛,杨曜如.从“主旋律”到“新主流”在共情中感悟影视作品的价值魅力[N].光明日报,2021-10-26(9)